



《大家论学》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

冯汉骥论考古学

冯汉骥◎著

百年国学巅峰论坛珍藏版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大家论学》

冯汉骥论考古学

冯汉骥◎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汉骥论考古学/段渝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8.1

(书馆考究丛书. 大家论学丛书)

ISBN 978-7-5439-3407-8

I. 冯… II. 段… III. 考古学—研究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296 号

责任编辑:张 树

特约编辑:夏 宇

冯汉骥论考古学

主 编 段 渝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172 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3407-8

定价:15.50 元

<http://www.sstlp.com>



弁 言

李学勤*

日前听到《大家论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很快即将付印问世，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作一推荐。

《大家论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见升温的当口诞生的。这几年，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期间，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作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究竟是继承而且创新的前提。

这里我们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二十年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又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其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



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二十世纪。比之清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二十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二十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重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论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



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博得欢迎。

这套《大家论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二十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萃，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二十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二十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2007年12月17日

于北京清华园



序

林 向

冯汉骥教授（1899——1977），我国的著名学者。他是运用现代人类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兄弟民族的前驱者、人类学西南学派的开创者、西南地区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从1931年起，冯汉骥先生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从名师攻读人类学，1936年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11月接受四川大学的聘请，任史学系教授，从此历40载春秋，辛勤治学，培育人才，成为桃李满芳华的一代宗师。

1938年，归国次年的冯汉骥先生不顾抗日后方条件恶劣，就全力以赴地做了三件大事：（1）开展民族考古调研：他只身赴岷江上游羌区进行民族调查，获取大量民族调查资料。并在汶川萝卜寨亲自发掘了一座石棺葬（SLM1），这是首次在川西北山地获得的第一手田野考古资料，其后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为西南民族考古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2）开展专题考古研究：首次对西南常见的大石遗迹作了专题考古调查，发表的《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一文，认为“武丁担墩为人造之墩，极可能乃古坟，是以石笋可能为坟之墓石”；另些“独石”则是“竖立大石以志重要事件”的标志物；至于成都弥牟、双流棋盘市、奉节鱼复浦等地的“八阵图”实与诸葛亮无关，“而可能具有宗教意义”的“列石遗迹”，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3）开展



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在先生的策划与主持下，四川大学师生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对四川省境内的石器时代遗址、汉晋墓葬、壁画、石刻、造像等文物作了调查研究与收藏保护工作，搜集的数千件标本资料后来全部移交给四川省博物馆筹备处。为了全面掌握文物情况以便开展考古、博物馆事业，在一省境内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先生不时告诫我等后学：“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生善于抓住重要课题，锲而不舍地上下求索。1942 ~ 1943 年，先生发掘成都西郊号称“抚琴台”的五代前蜀王建墓（永陵），这是国内首次发掘的帝王陵寝。它的发掘成功显示了先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考古发掘技术，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在此后的 20 年中，不论世道变换，先生潜心科学研究，陆续发表《王建陵墓的发现与发掘》、《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驾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王建墓内“大带”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等一系列论著，为最后完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有关王建墓的论著与报告至今仍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必读文献。

先生对考古学术的执著敬业精神一以贯之。例如 1944 年在四川大学校园内发现一座已残破的小型唐墓，先生一丝不苟，细致清理，保证了发掘资料的完整，并从朽坏的极细的银镯腔里取出一件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上有佛像、经咒、“成都县”、“龙池坊”、“印买咒本”等字样，为我国印刷术的发明与唐代成都的历史文化地位找到了极为珍贵的地下证据。

1951 年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先生出任副院长兼自然博物馆馆长，先生亲自坐阵，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田野考古工作。重要的发现有 1954 年配合成渝、宝成铁路建设在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发掘一批战国秦汉间的“船棺葬”，用



考古证明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巴蜀文化”青铜器的真实性。1960年先生主持编撰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出版，从此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的“巴蜀文化”、“船棺葬”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采纳的考古术语。又如1953~1956年配合砖瓦厂生产，在成都北郊羊子山清理出殷周时代的古蜀国三级夯土祭坛，底边长103米，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先秦最大的单体礼仪建筑，为探索古蜀文明打开了新思路等等。笔者谨述从先生在四川大学攻研西南考古学时的一些亲知亲闻，以窥其精深治学之一斑。

(1) “资阳人”的年代问题：1951年资阳黄鳝溪出土“资阳人”头骨化石。当1972年有人根据事后采集的数据称与头骨同层的乌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7500 ± 30 年，因此认为“资阳人”头骨应属于全新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于是疑云纷起。先生在1954年的手稿《关于资阳人的几个问题》公布后，结论就豁然开朗了。先生指出：头骨“已成化石，而份量亦相当重，所以其年代还是相当久远的”，它是“从上游漂流至此”，“离开了它的原始地层，断代时只能考虑它本身的特质而不能再联系其共存物”。现在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观点，认为“资阳人”头骨的年代应属旧石器晚期。

(2) “大溪文化”的命名问题：1962年我作为研究生，在导师冯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报告中经过仔细研究命名为一种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联系而又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大溪文化”，其年代约距今6000年前。1963年这本报告稿曾送给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出版审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约我面谈，并细询冯师对我的指导与最新研究状况。可惜的是后来经我修改后的定稿本和全部图、照在“十年动乱”中被人弄得不知去向，成了一大疑案。但是，“大溪文化”作为中国长江流域的一支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采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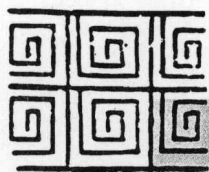
(3) 细心的观察研究，卓灼的科学预见：1963 年先生率领四川大学师生与四川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选择对广汉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先生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很可能此处原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们在此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证明三星堆遗址群确是夏商时期古蜀国的都城，证明先生科学预见的卓识。又如，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高度发展，中原商代的白陶和原始瓷器来源于长江及长江以南的印纹硬陶等事实，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指出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决不能局限于黄河流域。当 1976 年先生在病中看到公布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七千年前高度发展的稻作文化时，先生兴奋之状溢于言表。

(4) 鞠躬尽瘁，先生心血洒西南：1958 ~ 1959 年先生两次应邀赴云南参加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撰写了大量的笔记、手稿，陆续发表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鼓研究》等文，是对考古新发现进行综合研究的范例。先生综合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把考古资料、古典文献、民族学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对“滇文化”、古滇人的历史、族属、礼制、俗尚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成为“滇文化”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而且是中国人类学西南学派在考古学领域的研究范本。1975 年冬，先生抱病为从湖南、贵州前来求教的考古工作者作了有关夜郎问题的学术报告，从他自己对西南古代奴隶王国巴、蜀、滇的研究，谈到对夜郎探索的思路和方法，谈者神采奕奕，听众心领神会，但会后先生即感不支，进入医院一病不起。不意该学术报告竟成为先生的“最后一课”。

冯汉骥先生的中外文著作众多，这里仅选印其中有关考古学方面的 11 篇论文以饷读者，若能让我们从中领略先生论考古学的风采之一斑，则幸甚焉。



随葬器物	67
结 论	80
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	89
发现经过	91
画像砖墓的建筑	96
画像砖在地域上的区别	99
画像砖的制作	101
画像砖的年代	103
画像砖的内容	106
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	111
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	121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	147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	155
滇 族	159
滇族所统属下的各族	166
推 论	177
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	191
舞人（羽人）	196
翔 鹭	202
竞渡（船形纹）	205
关于云南铜鼓的起源问题	209



关于资阳人
的几个问题



“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的地层问题

资阳人头骨的发现，到现在已有三年多，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的确，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诚如翦伯赞先生所说：“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分布提出了新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①当资阳人头骨发现之初，我个人曾予以密切的注意，头骨也曾在前西南博物馆展览过一段时期。因为当时缺乏研究仪器，除作了一些初步的形态学上的观察而外，未曾予以研究。不过我觉得关于此一重要发现的出土具体情况和地层问题，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想提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种化石的年代，主要是靠它所出土的地层和其本身的形态，再加与其伴出的其他生物化石来决定。因为我没有参加关于资阳人头骨的采集及后来的发掘工作，所以只能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推断。

前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在关于成渝铁路筑路时出土文物的调查报告中，对黄鳊溪古生物化石、人类遗骨的报告说：“（一）资阳黄鳊溪龙骨化石——第一批化石是西南

^① 翦伯赞：《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



铁路工程总局资阳工段于1951年3月17日至21日在资阳县城西门外挖掘黄鳊溪大桥（铁路里程K148+395）至地面下8米（吴淞海拔352米）黑泥层内所发现。计牙骨三件、脊椎骨六件、肢骨二十三件、尻骨一件、膝骨一件、爪骨一件，骨片二十三件，共五十八件，已由资阳工务段长谭其芬亲身带往重庆西南铁路工程总局。第二批龙骨化石是从3月21日下午起到29日止，我组所收集的化石，计牙骨三十四件、角骨四件、脊椎骨二十二件，较大不明的骨类、化石三十五件，碎骨片六百五十九件，已由我组装箱运部。上述两批化石皆发现于黑土层中，仅有两颗白色牙化石，系在黄鳊溪桥另一桥墩基下所发现，其地无黑土层。……（二）人类遗骨——在黄鳊溪发现龙骨之地点，同时掘出头盖骨，此项骨类已变成土黄色，但尚未形成化石。已由谭段长带回重庆。^① 资阳发掘后，在裴文中先生参加的西南博物院座谈会上，原重庆大学教授张圣奘先生介绍了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经过：“挖掘黄鳊溪一号桥基时，在桥东不远的8米深处，发现了一些象齿，即特别加以注意，16日在铁路工程K148+395处发现一个人骨化石，只头盖骨及上颚骨两块，后来破为大小5块。我们当时悬赏数百元到一千元征求一个化石，其较大者赏额随之增加，并以一万元的赏额寻找下颚骨。附近化石收集了很多，但无人的颚骨。以后数日，继续注意收购，除部分动物化石外，再无其他人类化石发现。……总计在此处发现的化石共大小六百余件，内人类化石一个。还拾得两个半核桃和一包古树叶，作为参考的旁证。”^② 由此可知，调查小组的报告并未注明头骨化石确切发现地点，而张圣奘先生则认为在一号桥墩之东，以后《资阳

^① 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成渝铁路筑路当中出土文物调查报告》，《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11期。

^② 见《资阳发掘工作结论座谈会记录》，原西南博物院档案。